

开个玩笑说,都说宇宙的尽头是带货,所有的美好文字,惊艳或者猎奇的短视频到最后都是图穷匕见,东方甄选的大戏也是由带货而起。带货没有什么不好,卖书未必就比卖有机酱油更高级,说白了全是商品。

然而,全民带货只是一种表象,那么宇宙的尽头是什么呢?你四周张望一下,自己的亲朋好友有没有情绪低落,压力山大的呢?

鸡汤君说见人不要总是抱怨,要自带一点正能量。有人会说混得好的人肯定开心,我告诉你真不是,成功的人一般压力大。

为什么?就是所有的成功都是用命

搏来的。他们赚到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我认识一个搞餐饮的,年纪轻轻就秃了顶,别人形容他上厕所的时候都在想着怎么研制新菜,所以大家才说他该有钱。秃顶还好就是形象减分,有人直接就病了而且是泰山压顶的病。

再说中产阶级什么都是卡在安全线的边缘,日常生活就得精打细算,多出一项类似婚礼、祝寿、满月酒这种凑份子的事都得筹划半天,如果一戴口罩,或者家里有人生病,老的小的有点什么事,情况立马乱

# 宇宙的尽头

张欣

个中年大叔头上套着塑料袋(挡雪),骑着自行车大声哼着歌回家(或者去什么地方吧),看着他的背影不知为何非常感动。

也不是想要说什么苦中作乐,有自我感动的嫌疑,对苦日子有一种心甘情愿的接受。可是我又想,他可能过得也不苦,不见得大雪天、塑料袋、自行车就一定代表苦日子。没准人家就是不攀比不装,日子过得很随意。至少他的状态让



纸博

瞻仰巴金故居,每见客厅或书房的巴老雕像我会驻足凝视,以表缅怀。1983年,巴老住院。我去他家帮铺地毯。二楼的那尊满面笑容的雕像很是亲切,弥补了我未见到主人的遗憾。

几年后,我无意间问巴老雕像的由来。他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是苏联雕塑家谢里汉诺夫创作的”。事后,我从1958年3月4日《新民报·晚刊》(即《新民晚报》)上找到了谢里汉诺夫来华雕塑的图片新闻,看到报上的雕像与我所见的那尊是同模。说明词为:“在苏联白俄罗斯国立博物馆里,展出着白俄罗斯功勋艺术家谢里汉诺夫的一组新作品,其中有作家巴金、演员白杨、劳动模范黄宝妹的雕塑……”当年文联联系此事的徐铃回忆道,给巴金塑像外,还有白杨、赵丹、熊佛西。根据中、苏两国协议,谢里汉诺夫的住宿及餐费,与其一次结清,就是“包干”自理了。

一天,巴金如约来到文化广场,坐在谢里汉诺夫面前做“模特”。中午,巴金见他准备以面包加开水作中餐。他便对谢里汉

# 巴老的雕像

陆正伟

诺夫说:我也要吃饭,我请你。于是,他俩到文化俱乐部用餐,翌三天,巴金请他三次……

这尊塑像摆放在书房已六十余载。1977年12月,巴老与电影《家》导演陈西禾及演员魏鹤龄、黄宗英、王丹凤欢聚在书房里。我从照片上看,连这座雕像也好似以微笑喜迎文艺的春天。

2004年,巴老百岁。小林赠我一尊复制从众制作的巴老雕像,我将它置于书桌。雕像舍弃额头和双耳,突出脸部特征,给人以简洁的“残缺美”。

1983年,北京作家从维熙听说巴老住院,打电话请小林问候,并提出让中央美院油雕系毕业的儿



启封不久的书房里。

# 先生戴逸

谢俊美

生无愧为当代学人宗师。

戴逸先生离世已有半载,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音容笑貌,一口吴依软语,耿耿明哲的形象仿佛犹在眼前和耳边,令人怀念不已。戴先生出生在常熟,先考入上海交大铁路专业,后又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从此走上了治史的道路。晚年主持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项目,主编《清史》,为学界领军人物。

我认识先生,并与之交往,在很大程度上与研究翁同龢有关。他与翁同龢是同乡,我因搜集翁氏在籍的史料,遗闻轶事,多次去常熟。

大约在1983年,我去常熟,戴先生正好也回乡和我同住在当时的县第二招待所。经人介绍我们首次见面。先前我读过他的《简明清史》,对他的学问十分敬佩。初次相见,只见他个子修长,对我问寒问暖,十分亲切。对我研究翁同龢表示全力支持,并表示有什么困难一定想办法帮助解决。我听后,心里感觉到一股浓浓的暖意,感到遇上了一位好老师。果不其然,后来我到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查档,他给我写信分别介绍北京的诸多先生助我。因他的介绍,我结识了中华书局李侃、陈铮、陈东林诸先生和侯明、欧阳红等编辑,当时中华书局与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有业务联系,经中华书局推荐,我的《翁同龢集》纳入出版计划,后来最终得以出版。

在戴先生、李侃等先生的大力支持下,1993年我将50多万字的《翁同龢集》书稿寄给中华书局,请他们出版。当时苏双碧先生任《求是》杂志的负责人,知道我撰写翁传,特地请文化大家周谷城老先生为我题写书名。原计划由李侃先生书序,李侃先生很谦逊,对戴师说你是常熟人,翁同龢同乡,书序由你来写更合适,也算是对这项研究和出版的支持。戴师听后,二话没说就同意了。随即我将书稿抱回家中,冒着酷暑,将书稿通读一遍,并饱蘸深情地写了一篇言情并茂的序文。序文不仅高度评价了翁同龢清廉正直的一生,而且对清史研究提出了卓有见地的见解,也对我的这项研究给予了充分肯定、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书序写好后,直到次年8月“翁同龢与甲午战争”全国研讨会前夕,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才看到。直到这次开会,我从李侃先生口中才得知序文撰写的经过,深为两位学术前辈关爱后辈学人之举感动。两位先生虽已作古,但在此,我还是要说声“谢谢”。

戴师志存高远,立志学术事业,文合时运,立论宏通,笔带感情,自成一派。晚年不顾九旬耄耋之龄,全身心地投入中国历史科学事业,令人敬佩不已。古人云: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做了前人想做而未做或未做成的事,足以值得怀念了。



烟溪为我染莓苔 (扇面) 李雁

我生于1926年,194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因家境贫寒,当过雇工,深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生活十分艰难。那时日本鬼子抢掠掠夺,当地土匪趁火打劫,真是民不聊生。后来,苏北家乡来了新四军,建立了抗日革命根据地,组织动员大家参军抗日。国仇家恨让我铁了心,今生今世一定要坚决跟党走,坚信只有参加新四军才是唯一的出路。

1943年11月,未满18周岁的我毫不犹豫地随一批老乡报名参加参军。入伍后,我被分在新四军四师九旅二十五团一营三连当战士。我当时所在的新四军四师师长兼司令是彭雪枫。投身这支英雄的部队,我感到十分光荣与自豪。

1944年7月5日至12日,新四军第四师第九旅、第十一旅和淮北军区地方武装对安徽省泗县前张楼、后张楼等地的日伪军发起了“张楼战役”。我随部队也参加了此次战役。当时敌方有好几个炮楼据点,敌人躲藏在里面向外疯狂扫射,我们起初的进攻效果不好,子弹没有发挥出作用。后来,我们调整战术,几支部队合力围攻,人数在一个团以上,压制住敌人,最终艰难地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战斗中,敌军的炮火非常猛烈,我在冲向敌人炮楼时不幸负伤,右大腿和臀部各中了一颗子弹。随后,我就被送入部队野战医院,及时取出了子弹。所幸当时子弹只是伤到了筋骨。

取得“张楼战役”胜利之后,我们新四军第四师又继续西进,涤荡各地顽军,陆续收复了豫苏区八个县的地区,而我被转移到了后方医院继续治疗。在后方,我一边养伤,一边

# 愿做常青不老松

祁学喜

工作。不久后,我得到噩耗,我所在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在对敌前线指挥中不幸中流弹牺牲,时年37岁。得知首长牺牲,我悲伤不已,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继续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念。

待我复员回到家乡江苏省淮安时,这里已经成为解放区,但其中还有一部分尚属敌

占区,斗争形势依旧严峻。回到家乡后,我一边养伤,一边也没闲着,主动到乡政府帮忙。那会儿,乡政府正在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推行“三七分租、二五减租”的政策。党叫干啥就干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得到群众信任,为劳苦大众服务,就是我入党的愿望。

于是,经过努力和组织对我的考察,我终于在1945年2月入了党。1947年3月,我服从区委分配,担任乡政府民兵中队长。之后,我辗转多个工作职位,在不同的“战场”上挥洒青春热血,继续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后,我由江苏省淮安县公安局调任至上海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处工作。之后,我长期

纪实人文频道播放了辰山草地音乐会的实况录像,演出者是享誉全球的圣彼得堡爱乐乐团,不由得让人感叹辰山草地音乐会的规格一下子提升了几个档次。道理并不复杂,圣彼得堡爱乐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十大交响乐团之一,由威震国际乐坛的“指挥沙皇”穆拉文斯基一手调教,其执棒长达50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率圣彼得堡爱乐数次巡演欧美,所到之处,无不风靡,令欧美音乐界与受众心悦诚服。但圣彼得堡爱乐与上海的首次牵手却好事多磨,姗姗来迟,直到2008年才得以成功。此次圣彼得堡爱乐乐团的辰山草地音乐会,曲目由全套柴可夫斯基作品组成。当铜管奏出《意大利随想曲》起始部分宽广明亮的乐句,不掺丝毫杂质,仿佛蓝天般纯净,一股温暖的气息瞬间弥漫开来,如五月的春风和煦微醺,沁人心脾,也让我想起了十六年前第一次听圣彼得堡爱乐音乐会的点点滴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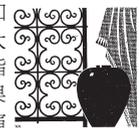
2008年圣彼得堡爱乐乐团的首次访沪演出在大剧院,由乐团音乐总监铁米尔卡诺夫领衔。记得音乐会开幕时间到点,乐团全体起立迎接指挥上台。只见身穿黑色燕尾服的乐队首席一头波浪长发,风度潇洒。他左手上执小提琴,有趣的是侧向观众的他双脚呈“稍息”状态,通常乐团起立时全体成员都是双脚并拢,他的与众不同无意中凸现了自己的鹤立鸡群,我还是头一次看见。而他朝向听众的眼神有几分好奇、自信,甚至有几分骄傲和玩世不恭,让我立刻联想到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男主人公与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渥伦斯基,他们之间的贵族气质大概差不多吧。当然,此系戏言,丝毫不影响我为圣彼得堡爱乐乐团首席的临场发挥点赞。我发现,这次辰山草地音乐会的该团首席依然是他,依然是熟悉的长波浪,只是面容显得苍老了,有了雕刻般的饱经沧桑感。但他作为乐队一哥演出时的专注投入和表率作用,一如既往,令人印象深刻。

铁米尔卡诺夫指挥的圣彼得堡爱乐大剧院音乐会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和《第四交响曲》,另一首乐曲由于时间太长实在记不清了。铁米尔卡诺夫的指挥语言大开大合,朴素简练,音乐效果却非常到位。尤其是“柴四”,乐队的演奏激情四射,又饱满凝练。第四乐章开头部分疾似暴风骤雨的快速段落,衔接的乐句乐队强调了一下,又转接得如丝滑般巧妙自然,犹如一辆高速奔驰的赛车有惊无险地通过急转弯道处,车手还不动声色与观众打了个照面。铁米尔卡诺夫作如此处理,足见其艺高人胆大,匠心独具,也充分展现了圣彼得堡爱乐在演绎本国作曲家作品时的深厚功力与韵味别具,让人大饱耳福,叹为“听”止。正好最近在看日本学者写的《古典音乐界的亚洲人》一书,其中有一章专门探讨作曲家创作的原创性、演奏的本真性以及亚裔音乐家在演绎西方古典音乐时能否掌握其要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否会否影响其演出等问题。这些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有共识。不过,圣彼得堡爱乐乐团演出“柴四”时的优异表现,说明一个优秀的乐团演奏本国作曲家作品时,在体现其本真性以及创造性方面,还是具有灵犀相通的独到优势和特色的。

指挥圣彼得堡爱乐辰山草地音乐会的是阿列克谢耶夫,他的艺术风格严谨规整,但同样富于艺术感染力。在演奏《天鹅湖》组曲中的《阿拉伯舞曲》和《双人舞》时,他给出的速度略慢,但音乐的展开充满内在的张力,细腻感人。担任柴氏《第一钢琴协奏曲》独奏的是钢琴家孔祥东,他的琴技精湛,宝刀未老。与世界一流乐团合作,值得他,也值得申城乐迷自豪。

# 辰山草地有佳音

刘蔚



铁米尔卡诺夫指挥的圣彼得堡爱乐大剧院音乐会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和《第四交响曲》。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在原卢湾区工作,直至离休。

如今,我和老伴都身体健康,坚持力所能及的事情自己做。我们居住在一栋老旧的砖木结构屋子一楼。靠窗左侧的那张桌子是我的书桌,除了每天在此读书看报,书桌上的这台收音机也是我的最爱。我每天都会准点打开收音机,了解一天国内外和上海发生的时事新闻,听一听自己喜爱的音乐和戏曲……回想当年抗日战争时期的颠沛流离,如今大家的生活都越来越好,吃的用的都不用愁,我和老伴对此很感恩,也很知足。

那时我还是党员,但是《党章》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指导着我的行动。我的入党故事 责编:刘芳